

蔡襄《荔枝谱》中的地理叙事与方志话语

王莹

提 要：北宋著名文臣蔡襄的《荔枝谱》是历史上第一部将荔枝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博物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地方文献，体现了蔡襄的地理叙事和方志话语。但究其实，《荔枝谱》的文本形态并非标准的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博物学文本涵纳广阔的特质；在植物性状、分类等自然属性的归纳总结中寓含了深刻的闽西地理叙事与方志话语，是作为地方史文献的名物纪胜与家国情怀的高度融合，以特殊的复合文本的形式，于地方物华之中隐喻着作者的经世致用和情感波澜。

关键词：蔡襄 《荔枝谱》 博物学 名物纪胜 地理叙事 方志话语

蔡襄作为北宋著名的文人士大夫，不仅以书法称名于当世并流传千古，还有《荔枝谱》一书传世。这也是历史上第一部将荔枝作为专门书写对象的博物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道：“荔枝之有谱，自襄始。叙述特详，词亦雅洁。而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是未知诗歌可极意形容，谱录则惟求纪实。文章有体，词赋与谱录殊也。襄诗篇中屡咏及荔枝，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四月池上》一首‘荔枝才似小青梅’句，即谱中之‘火山’；《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绛衣仙子过中元’句，即谱中之‘中元红’；《谢宋评事》一首‘兵锋却后知神物’句，即谱中之‘宋公荔枝’。盖刘亦闽人，故能解其所指，知其体物之功。”^①可见，蔡襄的诗作和其《荔枝谱》可形成互文关系，多相参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引洪迈《容斋随笔》中的记闻，以其事之诞，推测是好事者附会，认为此事“足见当时贵重此谱”^②。这一评价甚为恰切，蔡襄与荔枝在此谱推出之后成为密不可分的人与物的文化组合，宋代杜绾在其谱录著作《云林石谱》后序中陈述其写作动因时可作为明证：“窃尝谓陆羽之于茶，杜康之于酒，戴凯之于竹，苏太古之于文房四宝，欧阳永叔之于牡丹，蔡君谟之于荔枝，亦皆有谱，而惟石独无，为可恨也。云林居士杜季阳，盖尝采其瑰异，第其流品，载都邑之所出，而润燥者有别，秀质者有辨，书于编简，其谱宜可传也。”^③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述，蔡襄《荔枝谱》体现的是他有别于诗词创作的体物之功，他以谱录的纪实形式创作的《荔枝谱》，对于荔枝名物影响力的推动和强化并不亚于白居易、苏轼的诗词创作。他不仅以纪实化的系统归纳分析为荔枝作谱，还在其中融入自己深刻的地理叙事和方志话语。

《荔枝谱》在文本结构、内容呈现、起点立意、目标旨趣等诸多方面，无论是将其列为中国传统四部当中子部的谱录类，或者按照中国传统“农、医、天、算”四大知识体系的分类将其称为农书，抑或称之为现代语境下的“中国传统博物学”^④，都和西方博物学尤其是西方语境下的科学技术文本有较大差异。它的内容是以中国传统的采风记录为基础的名物纪胜，

①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15，中华书局，1997年，第1542页。

②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15，第1542页。

③ 杜绾、诸九鼎、高兆：《〈云林石谱〉〈石谱〉〈观石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④ 参见杜绾、诸九鼎、高兆：《〈云林石谱〉〈石谱〉〈观石录〉》，第1页。

记录和保留了与闽地荔枝相关的大量技术和知识,是中国传统博物文化和地方史文献的典型范例,体现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因此,更准确的认知方法是将其置于北宋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视之为一部代表蔡襄方志话语的博物学地方文献,才能对其做出更全面的认知、理解、分析和阐释,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并获得符合事实、启迪教益的结论。

一 《荔枝谱》地理叙事中的经世致用

《荔枝谱》并非只有行广博物之学的功能,而是在闽西地理叙事中寓含着初心使命与家国情怀,思想波澜与情感体验。

蔡襄的同时代人、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将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宋儒的初心使命和理想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横渠四句体现的不仅是传统儒家的理想追求,对宋代士人而言更是如此:“这四句话既是张载一生为学的归宿,也可以看作是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②故而无论是自然物本身、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本身自在的精神文化追求,都可置于儒家的思想和具体规定中进行统摄、把握和实践。在宋朝,宋儒的理想追求更加鲜明地体现于横渠四句中。传统儒家文士所撰述的文本,无论题材和体裁若何,皆具有明显的“史志”风格和“史论”特点,讲求情景合一、内涵丰富和微言大义。自司马相如起,历朝历代,诸如白居易、张九龄、杜牧、苏轼等文人名士对荔枝的不停吟咏,使荔枝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水果,而是与平民百姓和现实生活拉开了一定距离,成为代表上层精英阶层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的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意象。具体到蔡襄及其《荔枝谱》,在看似客观平实、观察记录乡国名物的一字一语之内,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波澜和情感体验,凸显着自身鲜明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

荔枝这种南国异果与中土所产水果有很大差异:“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缃,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③这与蔡谱所言“香气清远,色泽鲜紫,壳薄而平,瓤厚而莹,膜如桃花红,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绛雪”^④,实不相上下。花开盛日,美不胜收:“城中越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晚日照曜,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非名画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观揽之胜,无与为比。”^⑤物美且异且稀,自然贵重,兼其颇具异国情调,故得到皇室贵族的钟情珍爱。“扶荔宫中扶荔生,武皇移种自多情。奇花异果原难得,扶竹扶桑枉并名。”^⑥早期独皇室贵族得以享用,故而荔枝被视为高贵身份的象征物之一。荔枝的美味和难得也吸引了历代文人士子的好奇目光和内心向往,南朝梁刘琨的《咏荔枝诗》云:“叔师贵其珍,武仲称其美。良由自远致,含滋不留齿。”^⑦可见这远方的异果甚为难得,今日终于可以得偿所愿。张九龄在其《荔枝赋序》中说得更具体,称赞荔枝“状甚瑰诡,味特甘滋,

① 张载:《张载集·张子语录》,中华书局,2017年,第320页。

② 刘梦溪:《学术与传统》(中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941页。

③ 白居易:《荔枝图序》,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18页。

④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8页。

⑤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第5页。

⑥ 董运来主编:《荔枝谱》,南海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⑦ 刘琨:《咏荔枝诗》,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3册,第1497页。

百果之中，无一可比”^①。对于荔枝珍异与美味的赞颂，白居易可谓功莫大焉，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对荔枝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和刻画，其中《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言道：“奇果标南土，芳林对北堂。素华春漠漠，丹实夏煌煌。叶捧低垂户，枝擎重压墙。始因风弄色，渐与日争光。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大校白槟榔。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早岁曾闻说，今朝始摘尝。嚼疑天上味，嗅异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逾橘得霜。燕支掌中颗，甘露舌头浆。”^②从荔枝的生长变化到果实的色香味触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铺陈和描述。

同时，也因为荔枝的身份高贵和特异卓绝而成为一种文化意象，文士阶层将其视为博物致知、卓然不群或借古讽今的一个典型事物，从而进入很多文人的创作视线。因其品貌贵重且卓尔不群，故而文人雅士常将荔枝视为品性高洁、孤标傲世或怀才不遇的寄情抒怀之物。蔡襄在《荔枝谱·第一》中即言：“列品虽高而寂寥无纪。将尤异之物昔所未有乎？盖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夫以一木之实，生于海濒岩险之远，而能名彻上京，外被重译，重于当世，是亦有足贵者。其于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殖，而又道里辽绝，曾不得班于卢橘、江橙之右，少发光采，此所以为之叹惜而不可不述也。”^③名为叹息闽地荔枝品质第一却并不知名，字里行间透漏出的寥落失意和郁郁不得志之情跃然纸上，类似的怀才不遇之感在前朝记咏荔枝的名篇中已有体现。张九龄在夸赞荔枝的美味之后，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际，感怀说：“士有无效之用，而身在无誉之间。苟无深知，与彼亦何以异也。因导扬其实，遂作此赋云。”^④白居易在略显冗长的铺陈之后，其流落远方、时光易老而事业未竟之情与张九龄一般无二：“物少尤珍重，天高苦渺茫。已教生暑月，又使阻遐方。粹液灵难驻，妍姿嫩易伤。近南光景热，向北道途长。不得充王赋，无由寄帝乡。”^⑤

然而，除了皇祐三年（1051）至至和二年（1055）在朝堂和开封府短暂任职外，十余年间，蔡襄一直辗转任职于闽地各处，仕宦于江湖之远，常怀沉郁不得志之感。嘉祐四年（1059），蔡襄二知泉州，观张九龄、白居易等荔枝辞赋，不免心有戚戚焉：“张九龄赋之以托意。白居易刺忠州……列品虽高，而寂寥无纪，将尤异之物，昔所未有乎？盖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阳，再临泉、福二郡，十年往还，道由乡国……因而题目，以为倡始……此所以为之叹惜而不可不述也。”^⑥

虽然彷徨失意，但蔡襄并没有萎靡沉沦。儒家的初心理想和使命担当仍然让其时刻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辗转闽地任职期间，他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将宏大的政治抱负化为一言一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之中，体察民情，改革时弊，为百姓做了大量实事，体现了他的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蔡襄曾两知泉州，“他上疏乞减泉州身丁赋税，又疏浚甘泉，制定龟湖塘规，解决民间用水纠纷和水源管理问题。而其最突出的功勋是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大型石梁桥——万安桥”^⑦。该桥又名“洛阳桥”，横跨泉州湾，为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它的建成，

① 张九龄：《荔枝赋序》，任继愈主编，姚铨编：《中华传世文选·唐文粹》，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② 白居易：《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1170页。

③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第5页。

④ 张九龄：《荔枝赋序》，任继愈主编，姚铨编：《中华传世文选·唐文粹》，第40页。

⑤ 白居易：《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1170页。

⑥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第4—5页。

⑦ 金秋鹏：《蔡襄及其科学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对闽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①。万安桥在桥梁建筑工程技术上首创了“筏形基础”“浮运架桥法”与“种蛎固础法”等三大施工技术,尤其是浮运架桥法,至今仍是广泛使用的施工技术,在中国科技史和桥梁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②。

此年(1059)恰好也是《荔枝谱》的撰述之年。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万安桥记》,次年10月,复作大楷大字并刻石立碑,是为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书法珍品,其处理方式和最终结果与《荔枝谱》如出一辙。一年之间,蔡襄完成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在科技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皆具有重要意义,在蔡襄身上政治实践、技术实践、社会实践、艺术实践等皆为道德实践,其内在的感情、思想也是相通的:“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既成,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还京,道由是出,因纪所作,勒于岸左。”^③这种以民为本、经世致用的使命精神和家国情怀也贯穿于《荔枝谱》的字里行间。

开篇探寻荔枝之本始即提到:“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昼夜奔腾,有毒虫猛兽之害。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和帝诏太官省之。”^④说明汉和帝永元年间皇家贡荔枝给民生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危害,并用唐羌为民直谏罢贡荔枝典故为例,哀民生之多艰,表明作者思想倾向性。而在《荔枝谱·第六》中,民生民本思想表现的更为明显,谈及自己实验的晒煎之法时,蔡襄感叹说:“其费荔枝减常岁十之六七。然修贡者皆取于民,后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责赂,晒煎之法不行矣。”^⑤介绍牛心这种品质一般、却为稀罕的荔枝时,蔡襄间接表达了对贡荔枝带来的奢靡浪费和扰民生息的批评和不满:“皮厚肉涩,福州唯有一株。每岁贡干荔枝,皆调于民,主吏常以牛心为准,民倍直购之以输,予尝黜而不用。”《荔枝谱》深刻体现了蔡襄在撰写地方史文献时地理叙事的独特模式,其中寓含的经世致用是他作为士大夫文人使命意识的一种投射。

二 《荔枝谱》乡土情结中的民生理念

以荔枝为题托物言志,借古讽今,表达对于现实弊政的讽刺、不满甚或批判,对于民生的同情和关怀在传统诗文典籍里屡见不鲜。脍炙人口的有杜牧以运送荔枝入朝的典故,于强烈的反差中流露出辛辣的讽刺意味;苏轼以对岭南荔枝的喜爱,赞颂岭南荔枝之美好。

但因为荔枝进贡带给百姓沉重的负担,故而苏轼对贡荔枝这种行为本身却是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十里一置飞灰尘,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鹧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⑥因为对统治者骄奢淫逸和官吏们谄媚奉迎极大的不满和愤慨,苏轼甚至点名批评蔡襄,虽然他与蔡襄颇有渊源,而且对其书法艺术颇为推崇。“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⑦苏轼将蔡襄与北宋奸臣“五鬼”之一的丁谓并列,苏轼揭示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

① 项穆著,李中礼编著:《书法雅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25页。

② 蔡襄著,徐炯等编,吴以宁点校:《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59页。

③ 蔡襄:《万安桥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巴蜀书社,1992年,第24册,第188页。

④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第4页。

⑤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第15页。

⑥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11年,第11册,第425页。

⑦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11册,第425页。

皆进贡的弊政，给他增加了忠直感言、体恤民生的美誉，带给蔡襄的却是一顶“邀宠”的帽子。宋代福建海运兴盛，以海运为基础的商业贸易尤其发达，譬如荔枝的商业贸易：“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①这时，社会生产已经开始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地方特产成为风行海内外的名牌产品，会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人甚至从蔡襄《荔枝谱》附会出一段有隐喻意味的传奇故事：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莆田荔枝》记载，莆田方氏有荔枝树，结实数千颗，欲重其名，以200颗送蔡襄，骗他说今年所产只此数目，蔡为其著之于谱，名之曰“方家红”。自后所产，从未超过200颗。^②故事虽显然具有传说色彩，但毫无疑问说明名人效应带来的巨大价值。

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论，苏轼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固然应该肯定，但是蔡襄注重实际，学以致用，客观上推动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也应该得到肯定；而且他撰写《荔枝谱》的目的主要是民生理念和乡土情结生发的对家乡名物的推崇和热爱，记述之，宣传之，使它们能够“名彻上京，外被重译，重于当世”^③，“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才”^④，以取得利国利民之效，这正是传统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和入世家国情怀的突出体现。况且蔡襄对进贡给百姓带来的危害非常警惕并持批判态度，并竭力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所以苏轼的批评似有失公允。

闽东和浙东同属东南，地域相近，越文化和闽文化亦相近，自然、社会、历史人文环境类似，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具有相当的相似性。浙东事功学派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义理不能脱离功利，主张经世致用、农商一体和富国强兵。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王开祖和王安石过从甚密，且以欧阳修、尹洙、蔡襄等人来比拟王安石^⑤，不难看出蔡襄与事功学派及王安石之间的文化渊源和思想上的诸多共通之处。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诸要素之间，联系紧密，互相促进，互相贯通，福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在宋代达到高潮。“故宋代福建经济飞跃，文化发达，正如《毗陵集》卷6载：‘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省之邦。’……在闽文化史上，宋代福建文化最为兴盛。”^⑥“这一时期，科技人才辈出，科技硕果累累，可以说是集福建乃至全国古代科技发展之大成。在这批闽籍科技人才中，出类拔萃者有主持修造洛阳桥并著《荔枝谱》《茶录》的蔡襄……”^⑦而且闽人注重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的传统相当悠久。福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有着悠久的哲学和科学的思想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实事求是，学用一致。自古以来，福建的科技人才多能将自己的科学研究与当时的生产实际相结合，尽量做到学以致用，从而形成求知与求实、知识与实用相统一的好学风。”^⑧文化、科技、商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反过来自然环境也对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部分塑造了闽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感，至今仍然发

①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第9—10页。

② 参见武士明、许海杰编：《容斋随笔》（下册），西苑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③ 蔡襄：《荔枝谱》，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第5页。

④ 蔡襄著，唐晓云整理校点，顾宏义主编：《茶录（外十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⑤ 参见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⑥ 何绵山：《八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⑦ 周济：《福建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⑧ 周济：《福建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由蔡襄及其《荔枝谱》可窥其大概，略见一斑。《荔枝谱》作为地方史文献的意义，也在于它的存在将地方乡贤的乡土情结中饱含的生态智慧和民生理念呈现得蕴藉而高古。

三 《荔枝谱》方志话语中的家国情怀

《荔枝谱》的谋篇布局显示作者的匠心独运，行文用语却较为平实易懂，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体现了博物著作涵纳一套知识体系的“尚博”特性，其中的方志话语又表露出传统古文所充盈的士大夫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判断。知识、情感、社会、政治等融汇一起，呈现出形态丰富的多样性。蔡襄和宋仁宗赵祯年龄相近，几乎处于同一时代，讨论蔡襄及其《荔枝谱》，可以以仁宗朝为背景，二者点面同体，彼此映衬。从仁宗朝看蔡襄及其《荔枝谱》，可以在一个时代的历史大背景下观照并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及其著作的生发变化；反之，从蔡襄及其《荔枝谱》可以管窥北宋仁宗一朝闽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些基本的历史状况。

研究任何一种中国的传统文本都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蔡襄《荔枝谱》自然亦如此，科技史研究者一般将《荔枝谱》视为农书或植物学著作，国学研究者则将其归入子部的谱录类。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观察描述一种地方物华的文本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①的文化特质，视为博物学视野下的地方史著作似更为合适。

但无论形式上将其视为何种著作，都不妨碍我们从多个观察视角切入，体悟其内容，分析其内在复杂的思想情感。因此，蔡襄在《荔枝谱》中体现出的身份与其说是一名科技专家，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更为确切，而且从该书内涵的思想情感来看，是具有鲜明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可以算是宋儒的一个突出代表。同时蔡襄还身居高位，与欧阳修、余靖等人同为谏官，是庆历新政的革新派干将，后来还曾权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财政。他还是文化名流、艺术名家，其书法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为“宋四家”之一……在北宋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巨大。尽管身份如此复杂多样，但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看，所有这些基本都可以涵盖在“士大夫”或“文官”这一术语中。我们不妨从蔡襄这一代表性历史人物及其代表性方志话语文本《荔枝谱》出发，管中窥豹，分析北宋尤其是仁宗一朝政治与社会的大致状况。

作为北宋前期文官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蔡襄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与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他所有重要文本创作都蕴含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情感体验，从早期的快意恩仇、踌躇满志到后期的平实内敛、中庸适度，既是现实政治和权力话语变化的结果，也是个人思想不断调适和发展的显示，从蔡襄早期的一些文本和《荔枝谱》的强烈对比中，能显著地观察到这一点。

除了奏议公文和政论文自然具有政治性之外，蔡襄早期的一些个人诗文创作亦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文学性，尤其是他于景祐三年（1036）创作的《四贤一不肖诗》。是年5月，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遂被罢黜，改知饶州。范吕之争，牵连甚广，影响甚巨。

^①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76页。

侍御史韩洙请以范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二人因此被贬。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被贬夷陵。

时任西京留守推官的蔡襄年仅25岁，充满正义感和理想主义色彩，加之和欧阳修为同榜进士，且已有两年的共事经历，彼此知心，志同道合，适逢此事，无论为国为友抑或从心所欲，皆需发声，遂作《四贤一不肖诗》。此诗一出，一时洛阳纸贵，影响巨大。北宋笔记《渑水燕谈录》记载：“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辽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谓若讷也。”^①此时的蔡襄青年热血、行为激进、言词激烈。泗州通判陈恢上章请求追究蔡襄之罪，幸得左司谏韩琦仗义相救，劾陈恢越职希恩，宜重行贬黜。结果，朝廷采取充耳不闻的做法，对陈恢和韩琦的奏章都作“不报”处理。《四贤一不肖诗》“虽然没有改变政府当时的决策，但是这首诗为庆历三年范仲淹等人进入政权的核心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蔡襄可以说是一诗成名，以此加入到所谓‘革新派’的阵营……蔡襄由此在北宋政治舞台尽情表演，终成一代名臣”^②。

蔡襄虽然因为《四贤一不肖诗》获得巨大的政治声誉和良好的政治前景，但是九年之后庆历新政的失败却带给他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在此之后，他一直辗转任职于各地，仕宦于江湖之远，常怀沉郁不得志之感。昔日同志四处离散，政治理想的实现日趋黯淡，但宋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安心实务，寄情地方，也就成了有志文官践行道德、实践理念的一种必然选择。蔡襄随着年龄、阅历和政治经验的增长，个性修养和政治素养都走向成熟，逐渐由当初的狂放任事、书生意气转变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持平稳重、注重实际。由此观之，蔡襄在庆历新政后任职地方期间，注重地方实务，发展并积极利用地方知识，著书立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个人阅历和思想情感的变迁使然，同时也是国家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间，他的文风、艺术风格及价值取向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反映在他的文本创作中，少了激扬奋激之言，多了笃实适中之语，博物学地方史文本《荔枝谱》的撰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宋代前期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达到较好的和谐平衡状态，这与代表人物兼具知识分子的文官身份、尚博尚雅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引领者身份、为民请命匡时济俗的社会代言人身份之三重身份有密切关系。文官尚博尚雅取向领一时风气之先，间接促进知识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进步，同时也直接促成了《荔枝谱》这类博物学地方史文本在宋朝的巨大发展，并有力地促进了皇权、士权、民权三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主要通过宋儒文官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才较好地达到并维持三力平衡这一状态。文官制度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不仅对于政治和社会来说如此重要，文官艺术审美旨趣也代表一个时代、民族、地域的价值取向变化。蔡襄由早期的任意狂放到后来的求真务实，也说明当时社会政治生态和民众理性的成熟。

不过到了北宋中后期，“诗文干政”现象愈演愈烈，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出现了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③士风引领社会风尚，决定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性格

① 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下卷），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第669页。

② 李强：《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

③ 参见李强：《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

和价值取向。“文官政治”在中国传统的集权社会，主要代表文化力量，能够在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维持一定的张力和伸缩空间，起到缓冲、调节和价值引领作用，对于维持3种力量之间的和谐平衡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健康至关重要。“诗文干政”恰好说明文官政治的文化力量超出皇权的政治力量，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力量失衡。如果没有强势的君主扭转局面，恢复平衡，必然导致文化力量过于凸显，书生任气、尚谈轻实、过于理想化的这些缺陷就会逐渐显现，同时文人相轻，注重价值判断、轻视事实判断，由此导致“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和政治风范的逐渐丧失，就会渐渐形成朋党政治，从而导致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社会力量三者失衡。节流为主的“庆历新政”和开源为主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形式、内容不尽一致，但通过改革回归这一平衡的努力却是一致的。

因此，作为蔡襄寄寓家国情怀的方志话语文本《荔枝谱》所暗含的理念和指示的文明发展方向，是符合社会及历史的发展趋势的，直至今天仍未过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结 语

蔡襄的《荔枝谱》作为地方文献中的瑰宝，历史上第一部将荔枝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博物学著作，不仅在当时和后续朝代成为文人仿效的博物学地方史经典，还获得世界性的声誉。李约瑟对蔡襄做出“对能够造福他们本地区人民的栽培植物表现出很大的热情”^①的判断，并列举《荔枝谱》作为例证，肯定其在世界植物学领域的开创之功。蔡襄《荔枝谱》以其福建家乡的物华荔枝作为书写对象，虽冠以植物学著作的名称，实际上文本形态却并非标准的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博物学和地方史文本涵纳广阔、思想深邃的特质。它不是单纯的客观意义上的植物性状、分类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表述，而是在荔枝自然属性的归纳总结中，寓含了深刻的闽西地理叙事与方志话语，是一种隐形的乡关之思沉郁笼罩下的名物纪胜与家国情怀的高度融合，隐喻着作者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和起伏澎湃的情感波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英] 李约瑟著，袁以苇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第6分册《植物学》，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